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

General Collection of Eight Great Literators' Essay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

郭预衡 郭英德◎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柳宗元 韩愈

卷1

卷1

General Collection of Eight Great
Literators' Essay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

新版校评 修订本

郭预衡 郭英德◎主编

韩愈
柳宗元

◎校评 李道英

◎校评 郭英德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郭预衡主编.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202-07087-1

I. ①唐… II. ①郭… III. ①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散文集 IV. ①I2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2500 号

书 名	新版校评 修订本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 (全十卷)
主 编	郭预衡 郭英德

选题策划	杜金卿 张晨光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装帧设计	王 梓
责任校对	张三铁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36.25
字 数	5 917 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087-1/I·917
定 价	1500.00 元 (全十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

韩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是司马迁之后最重要的散文作家。

韩愈在我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说虽不尽确切，但也确实道出了韩愈一生为人、为文的某些基本特点。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本人屡称“昌黎韩愈”，故世称韩昌黎；他曾两任吏部侍郎，故世称韩吏部；死后谥号“文”，故世又称韩文公。

韩愈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中小地主家庭。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令，清正廉洁，颇有美政；其叔父韩云卿，为大历年间有名的文章家；其叔父韩少卿、韩绅卿，均为有政绩的下级官吏；韩愈的大哥韩会当时一位名人，好谈经济之略，以王佐之材自许，官至起居舍人，与宰相元载过从甚密。韩会既是政治的热衷者，又是古文的爱好者，与当时的古文家梁肃、萧存为友。韩愈三岁丧父，由大哥韩会及大嫂郑氏抚养。这样一个没有很大权势、政治和经济地位都不算高的庶族地主家庭，浓厚的文学和儒学气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韩愈一生的生活道路、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

韩愈主要生活在中唐的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四朝，这是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而又表面上相对稳定的时期。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十岁的韩愈随兄嫂到韶州，二年后韩会病故，韩愈随嫂郑氏返回故乡，时值中原战乱，又随嫂迁居安徽宣城别业。家庭的不幸，磨砺了少年韩愈的心志。

韩愈七岁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新唐书·韩愈传》）韩愈刻苦攻读，目的就是要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靠门荫而飞黄腾达，只能靠个人奋斗。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十九岁的韩愈赴长安求官。他对自己的学问、才干十分自信，认为此去必能俯拾青紫，实现自己的宏伟志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在长安蹉跎几近十载，“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虽于贞元八年（792）考中进士，但接连三次博学宏词科考试均名落孙山，这对他是很大的精神打击。他从到长安的第二年起，已不能从家中得到物质支援，生活陷入了极端贫困的境地。仕途不达，生活困窘，也曾使他产生过放弃仕途、归隐著书立说的念头，但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忧天下之心战胜了隐山林之意。他又积极为入仕而奔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曾三次上书宰相，毛遂自荐，请求做官，但尸居禄位的贾耽、卢迈、赵璟等根本未予理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怀着郁愤的心情，于贞元十一年（795）五月离开长安，东归洛阳。

眼看到了而立之年，韩愈竟未求得一官半职，怀才不遇之感自不待言，然而他一到洛阳，便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节度使董晋看中，辟为汴州观察推官，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薨，汴州乱，韩愈又至徐州，在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以试协律郎的职衔任节度推官。又因其发言直率，无所畏避，竟与张建封不合，于贞元十六年夏离

开徐州、返回洛阳，在一个草树茂密的乡间过着读书、写作的生活，并于贞元十六、十七年两次赴长安听从调选，终于贞元十八年二月出任国子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拜监察御史，又因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幸臣李实，被贬为阳山令。在阳山任上，他关心百姓疾苦，是一位颇得民心的地方官。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崩，顺宗即位。二月，大赦天下，韩愈本可回京任职，但为湖南观察使杨凭所抑，长期俟命于郴州。同年八月，改元永贞。不久，顺宗退位，宪宗即位，又大赦天下，韩愈依旧未能回京，他所得到的新任命是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夏，奉调回京，任权知国子博士。在京城，不时遭人嫉妒和诬陷，遂请求分教东都。后出任都官员外郎，司祠部，正浮屠。因日与宦官为敌，不久，又被左迁为河南令。元和六年（811）回京，任职方员外郎。元和七年，又因华阴令柳涧案，以“妄论”罪被降为国子博士。韩愈“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新唐书·韩愈传》）。元和九年，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元和十年，任中书舍人。

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恶性膨胀，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唐宪宗决心惩治藩镇，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均积极主张武力镇压藩镇。元和十年，镇州节度使王承宗等派人刺杀了武元衡，刺伤了裴度。在藩镇气焰甚嚣尘上之际，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力主武力讨伐淮西藩镇，因与主和派宰相李逢吉、韦贯之意见不合，遂被改为太子右庶子之闲职。元和十二年（817），宪宗用宰相裴度为帅讨伐淮西，韩愈为行军司马，积极参与淮西之役，平定了淮西的藩镇叛乱，韩愈因战功升任刑部侍郎，并受命撰《平淮西碑》。

淮西之役后不久，宪宗为一时的胜利所惑，认为可以高枕无忧，除奢侈享乐外，既佞佛，又信道，企求长生不老。元和十四

年，唐宪宗派人将佛骨从凤翔法门寺迎入宫中供奉三天，此举轰动长安，波及全国。韩愈一向反佛，遂上《论佛骨表》一文，大骂佛骨是“凶秽之余”，指责宪宗迎佛骨是“伤风败俗”之举，由是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在潮州帮助老百姓消除鳄鱼之患，拿出自己的部分俸禄兴办文教事业，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之事。不久，他又量移为袁州刺史。在袁州，他曾释放奴婢七百余入。

元和十五年（820），宪宗崩，穆宗即位，九月，韩愈被诏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七月转兵部侍郎。长庆二年二月，韩愈又奉旨至镇州宣抚王庭凑，不辱使命而归，转为吏部侍郎。长庆三年，又出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因与御史中丞李绅不协，复为兵部侍郎，不久又转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因病辞官，不久病卒，赠礼部尚书。

韩愈的思想极为复杂、矛盾。这既有他的家庭和他所受教育的影响，也有社会现实的原因。

韩愈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生七岁而学圣人之道，以修自身”（《上宰相书》）。“愈自知读书，……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新唐书·韩愈传》）。“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上兵部李侍郎书》）。可见，他既读儒家的书，也读诸子百家的书；既受儒家思想影响，也受其他各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热切关注现实、识时知变的人物。“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郑尚书书》）。因此，他并非一味照搬古圣先贤的教条，而是在总结历史的盛衰兴亡和当世的利弊得失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是唐王朝衰落大趋势中的小中兴时期。安史之乱后，国家虽大体归于统一，德宗、顺宗、宪宗时社

会也曾出现过某种中兴复苏的迹象，但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宦官酿祸于内，藩镇作乱于外；朝臣中朋党倾轧，争权夺利；社会上佛道盛行，风气败坏；长期的社会动乱，更使经济凋敝，民生多艰。要使这样一个社会走向大治，韩愈认为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所以他不遗余力地标榜儒家思想，要求按儒家思想建立起严格的封建统治秩序：“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原道》）

韩愈确实是个皇权主义者，但为了建立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他也深知赢得民心、让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的重要。在这一点上，他又继承了儒家“仁政爱民”的传统思想。他认为统治者应体恤百姓痛苦，应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进而安居乐业，反对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为此，他不但关心农事，反映民间疾苦，认真探讨老百姓“穷且盗”的原因，而且在关键时刻敢于不顾个人安危，直言进谏，为民请命；他还敢大胆批评官吏们对老百姓无休止的诛求：“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其不去为盗也亦幸矣！”（《送许郢州序》）可见，韩愈要求建立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并非是要置老百姓于死地，而是要从根本上理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以治下，下以事上，保证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进而达到长治久安。

为了建立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韩愈对有害于这一目标的思想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唐代儒、释、道三家并重，中唐时佛、道盛行，对社会危害颇大。韩愈认为：佛道之徒“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原道》），佛、道盛行是老百姓“穷且盗”的重要根源，所以，舐排异端，攘斥佛老，就成为韩愈思想的重要特点。

由于韩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坚持了儒家的思想路线，所以我

们说，韩愈思想的基点是儒家。但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韩愈并非醇儒，更非腐儒。

唐朝不是周朝，韩愈当然不可能照搬孔、孟的思想来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儒家基本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要识时知变，解决社会矛盾，这就构成了韩愈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从哲学思想来说，韩愈一生的确说过不少宣扬鬼神迷信的话，除了像《原鬼》这样的荒诞之说外，还在许多场合大讲天命，鼓吹“天刑”、“人祸”，甚至宣扬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的东西。这些都表现了他的唯心主义思想，都是为了强调建立儒家道统而把它说成是天地鬼神的意志，是人力难为的，企图通过将其神圣化进而使之永恒合法化。但当韩愈直面现实之时，他在不少场合是反对鬼神迷信的：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他大胆宣称“说神仙者妄矣”；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他斥服食误死者“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乃悔”，讥其“蘄不死，乃速得死”。此外，像《论佛骨表》、《华山女》、《谢自然》等诗文，都表现了他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在人性问题上，韩愈也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当他强调建立儒家道统之时，便经常搬出性三品、天赋道德论，实际上是要人们承认统治者有天赋的特权，把人们的智愚善恶差别说成是先天的、不可变更的，以此来说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进而从理论上肯定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但当韩愈面对社会现实问题时，他又往往是批判这些谬论的。如在《师说》中，他提出“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的看法；在《符读书城南》一诗中，他十分强调后天教育对改变人的智愚善恶的决定性作用。

韩愈对孔孟儒学最大的不敬还在于他并不完全相信儒学万能，因而说了不少离经叛道的话。儒家历来提倡孝道，甚至鼓吹

避讳、割股等愚孝之举，对此，韩愈深恶痛绝，并在《讳辩》、《鄂人对》等文章中大胆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儒家历来讲礼治，讲仁义，反对法治，反对功利，而韩愈并不相信仁义万能，他非常讲现实，讲功利。他不仅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高度评价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商鞅，而且他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不少主张都贯穿着法治思想：如对待藩镇，他反对姑息养奸，而主张武力讨伐；他还竭力鼓吹明赏罚：“兵之胜负，实在赏罚。赏厚可令廉士动心，罚重可令凶人丧魄，然可集事。不可爱惜所费，惮于行刑。”孟子称：能距杨、墨，才能称圣人之徒，而韩愈不但在《争臣论》中称禹、孔子和墨子为二圣一贤，而且在《读墨子》中强调儒墨互用：“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儒家历来反对道家，而韩愈不但在《师说》中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而且在《读鸛冠子》中推崇黄老刑名之学。对儒家历来讳莫如深的一些问题，韩愈都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冲破了传统儒家思想的藩篱。对这一点，苏东坡看得十分清楚，他在《韩愈论》一文中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待孔子、孟轲甚尊，其距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此论应该说是中肯的。

韩愈曾批评荀子和扬雄对儒学“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而他自己则更为“不精”、“不详”。韩愈的思想的确很复杂、很矛盾，但都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个基点上统一了起来，其独特之处是：合儒墨，兼名法，以儒为主，杂取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出发点的一种实用主义新儒学。他的所谓“道”，确实是“道其所道”，但其思想的主导面与当时社会现实是基本适应的。当然其思想上的唯心面、落后保守面，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韩愈的思想基础决定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态度。对韩愈的政治态度问题，历来意见不一，而争论的核心是他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政治利益？他是顽固派，还是变革派？列宁在《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们评说韩愈的政治态度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韩愈一生热衷仕宦，其动机何在呢？他在《答卫中行书》中说：“其所以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其志耳。”其志向又是什么呢？“事业窥皋后，文章蔑曹谢”（《岳阳楼别窦司直》）。“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答崔立之书》）。看来，不外乎登上高位，为国家兴利除弊，忠君安民。从其一生的全部言行看，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方面，在对皇帝的竭忠尽力方面，他确实是屈原、杜甫一类的人物。他从维护唐王朝的统治出发，热切关注时政之得失，敢于正视严酷的现实，并以极大的勇气，大胆揭露和指斥时弊，积极干预现实，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表现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而由于最高统治阶级的提倡，佛、道泛滥，加剧了社会矛盾。所以反佛、反道的问题，首先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韩愈一生排斥佛老，态度坚决，言辞激烈，他为此付出过沉痛的代价，但至死不变。《原道》、《论佛骨表》、《与孟尚书书》等均为其代表作。韩愈虽未能从哲学思想上、从具体的教义上对佛、道作深入的理论批判，但他敢于冒反皇帝、反世俗的风险，以大无畏的精神，着重从政治观点上批判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这正是他见识和勇气的过人之处，也是他高于其前辈之处，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已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韩愈一生坚决站在反对藩镇割据一边，力主武力镇压藩

镇，主张国家统一，维护中央集权。

中唐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为害最烈的时期之一，他们控制朝政，权在人主之上。韩愈对骄横不可一世的宦官向无好感。他虽然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中对监军制有所称颂，在《永贞行》一诗中也骂过永贞革新不该夺北司的军权，但他一生反对宦官的倾向十分明显，在洛阳时“日与宦者为敌”，在《顺宗实录》中揭露宦官干政，反对官市等，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韩愈虽然骂过永贞革新是“小人乘时偷国柄”，但他从来未参加过反对永贞革新的政治活动；他始终认为革新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好人，并始终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与永贞革新的基本内容大体一致。

中唐朝臣内部党争剧烈，韩愈一生生活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但他从未投靠某个帮派。他虽然在很多地方大谈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之间“前后相资”、“上下相须”的理论，但其根本出发点还在推行自己任人唯贤、奖掖后进的用人路线，而不在溜须拍马、拉帮结派以谋取私利。

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韩愈既有主张剥削有理、鼓吹劳心者治人和对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等剥削阶级的“共性”，更有同情人民苦难、反映人民不幸，体恤孤贫、为民请命的“个性”。

总之，韩愈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独到见解，敢作敢为，富有斗争精神的人物。他不大会“趋时”、“附势”，却不时因“抗上”而倒霉。韩愈不是当时腐败政局的制造者和既得利益者，不是现状的维持派，而是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变革派。他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倾向十分明显，他在政治斗争中始终态度积极。他虽然经常被人诬蔑和误会，也多次遭到贬斥，但始终没有消沉和屈服：他既没有在遭打击后屈事权贵而谋取高位，也没有逃避现实去过隐居的生活。他虽然经常有牢骚不平，在触及个人利益时他也有过软弱和动摇，但他始终热切关注现实。他是皇帝

的忠臣，而不是朝秦暮楚、无原则依违于各派政治势力的政治奸商。他在思想上、人格上都有不少落后的、庸俗的习气，但仍不失为一个政治品质磊落、思想作风正派的官员。他的缺点和落后面是一般封建士大夫所共有的，而他的优点和进步面则是很多封建士大夫所远远不及的。

韩愈算不得什么出色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德行昭著的仁人君子，但他却是一位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大家。

韩愈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毕生致力于古文运动和文学创作，不但在中唐时期“手持文柄，高视寰海”（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主盟文坛，而且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无穷的影响。

韩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和在理论上的高度自觉。他从来都十分重视文学的实际功效和社会价值。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他明确写道：“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在他看来，作文立言其意义不在从政做官之下。在《答李翊书》中他又说：“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于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显然，他把文章与事业、道德、思想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对文章的价值与作用的新看法，是他一生献身于文学事业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杰出文学家的高度事业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韩愈从事文学活动和领导古文运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动遭谗谤，进寸退尺，卒无所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

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砉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书》）。仕途的不顺，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学活动和创作研究。韩愈生活的中唐，骈体文依旧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韩愈要应举求官，也不得不“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学”，但他十分憎恶这种“俳优者之辞”，每有所作，则“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答崔立之书》）。而他写作古文，又遭到讥讽和排斥。“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矣”。及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与冯宿论文书》）。但韩愈经历了挫折和磨难，坚定了信心，坚持了自己的道路。他蔑视困难，知难而进，最终完全摆脱了骈文的影响，写出了成熟的新体散文。

韩愈不但自己从事新体散文的创作，而且广交朋友，奖掖后进，团结了柳宗元、刘禹锡、李观、欧阳詹、樊宗师这样的朋友和李翱、皇甫湜、张籍、沈亚之等所谓韩门弟子，在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吸引了当时许多学者向往和归化，使古文运动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冲击着文坛，改革了文体，转变了文风，取得了古文运动的重大胜利。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评价韩愈说：“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的确，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此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自觉地从事于文学事业，这对后世的作家和文学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韩愈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为中唐的古文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主张，把古文运动置于明确的理论指导下，保证了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

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代开始，就有人起来批评骈体文的弊病，揭开了古今文体之争的序幕。在从齐梁到中唐的三百年间，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都不满意骈文的浮艳空疏，都提出过改革文体的理论，也都积极进行了各种创作尝试，为古文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局限性：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文学演进的问题上陷入了形而上学。他们对经、史、子及骈文、辞赋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的看法太绝对化，他们把儒家的经典视为文章千古不易的典范，而对骈文、辞赋这些颇具文学色彩的东西一概排斥和否定，即是说，他们没有处理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其次，他们中的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吧文道关系绝对化，使二者对立起来，他们片面地否定文采，重道轻文，文道混淆，甚至以道代文，片面地认为一讲文采就会影响“道”的表达。未能正确处理好文道关系，这是前期古文家们的又一严重不足和失误。其三，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古文理论，也未能写出典范的古文作品。强调复古、贯道的人，往往食古不化；而另一些人则又未充分认识文体改革的重要性，他们一边批评骈体文，一边用骈体文进行创作，这种倾向又使他们划不清与骈文的界限。这两种倾向，既影响了他们理论上的完善，也影响他们的创作实践，使他们写不出典范的古文，开不出一代文风。这些经验都急待总结，失误都急待矫正，而这个集大成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在了韩、柳的肩上，而韩愈更是首当其冲。

韩愈认真总结了它的前辈们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认识和创作体会，为古文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主张。

中唐文坛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依旧是文道关系问题，重文轻道的骈文作家与重道轻文的古文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均出现了偏颇。韩愈高屋建瓴，从新的角度和新的高度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在《争臣论》中，他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创作原则，“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比较明确地揭示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明道”是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为文”则是韩愈乐之终生的事业。韩愈对文学的兴趣在于写言之有物的新体古文，而不在于宣传儒家的教义。他的所谓“道”，也就不见得一定是儒家的大道理，更多的则是具体的一事一物之理，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文章的思想内容。韩愈十分重视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文”要为明“道”服务，但他并不重道轻文。他说：“本深而未茂，形大而声宏。”“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答尉迟生书》）“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韩愈避免了重道轻文和重文轻道两种倾向，把文与道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古文理论有了质的提高，并将文体改革同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大斗争结合起来，这是他对文学发展最富创造性的贡献之一。基于他对文道统一的要求，他又特别重视作家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在《答尉迟生书》中，他提出了“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的观点；在《答李翊书》中，他提出了“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的观点，都强调作家思想品德修养的重要，强调道德修养应先于立言为文。他甚至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气盛言宜”的观点更强调了“气”对文的主导作用，道出了养气与为文的关系。

文以明道，文道统一，这是韩愈古文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它为古文运动的发展端正了方向。

其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进行变革。韩愈博览群书，师承极广，又不囿于一家一派，能“沈浸醖郁，含英咀华”，博采各家所长，铸就一家之体，这本

身就是对旧文体的一种突破和解放。更可贵的是他又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新的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

在文体方面，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以散体取代骈体，他心中所向往的是质朴明晓的散文，“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旧唐书·韩愈传》）。骈体文是古文运动的改革对象，但韩愈对骈体文并未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一笔抹杀。他不但对优秀的骈体作品有所肯定，而且也不一味排斥骈体文的表现方法。他反对骈体文僵死的形式，但并不反对运用骈偶句，在他的许多名作中，都大量运用排比、对偶，骈散相间，颇富气势。蒋湘南说：“浅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七经楼文钞》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吸六朝之髓，这正是韩愈的过人之处和成功之处。

在文风方面，韩愈对六朝骈文轻靡浮艳之习持坚决批评的态度。他反对雕琢，“不以雕琢为工”，力主文风应质朴自然，并通过自己优秀新体古文的示范作用来扭转文风。

文学语言是韩愈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总体而言，他主张以秦汉散文的单行句式为主；从具体内容看，他有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一方面，他主张务去陈言，词必己出，反因袭，贵独创。他明确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提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即使是对经典著作，也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词”（《答刘正夫书》）。他反对抄袭剽窃，力主大胆创新：“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世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同上）他甚至为求新、独创而主张“怪怪奇奇”，极力标新立异，不落俗套。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文学语言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讲究文句的妥帖流畅，书面语言要规范化，要符合语言的规律和自然气势，反对艰涩怪异。“文章语言，与事相侔”，要“因事陈词”，并且要做到“丰而不余一言，